

(上接第14版)

宣稱中國“現在是且在未來幾十年中都將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批評美國過去“過多地關心接觸、融入和援助”，應實質性修改對華戰略，“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上升”。這種極端的論調意味着美國部分人對中國的看法從“無法阻止中國崛起、祇能塑造中國方向”的“接觸”轉到“無法阻止中國崛起、也無法塑造中國方向”的焦慮，再變為要“想辦法制衡甚至阻止中國崛起”的急切。這部分人在美國戰略界雖然不是主流但其動向值得注意，他們對特朗普總統身邊某些謀士的觀點也有影響。即便是主張實行穩健對華戰略的學者，其論述也充滿了對中美關係的憂慮。如學者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在這場辯論中提出的中美關係正在接近“臨界點”的說法，引起了中美兩國學界廣泛的關注。杰弗裏·貝德(Jeffrey A. Bader)在批評了美國戰略界“順應”和“遏制”中國崛起的聲音之後提出美國應該奉行“在全球層面合作、在地區層面堅定”的戰略。其中“在地區層面堅定”也強調了中美關係的消極面。總體來看，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焦慮程度、對華觀點的消極程度都是冷戰結束以來所未有的。這一變化不僅影響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而且將構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對華戰略時的外部環境。

四、特朗普政府“互惠”交往？

截至目前，要預測特朗普未來的對華戰略走向仍然十分困難。不過，以上對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戰略邏輯演進歷史的分析，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特朗普迄今為止的種種涉華言行，理解他在一個什麼樣的邏輯起點上、什麼樣的戰略環境中制定對華戰略，並對其戰略走向做出一些初步判斷。

從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邏輯的演變歷程看，結構性因素是決定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決定性因素。近30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從“內外一強弱”關係逐漸走向“體系內兩強”的過程。與此相適應，美國對華戰略自然也要經歷一個調整、適應的過程。一方面，冷戰結束後近30年的歷史顯示，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縮小，而中國國家發展方向與美國的“期待”之間差距越來越明顯。由于美方越來越認定崛起的中國不會變得“更像美國”，甚至可能成為其挑戰者，因此對華焦慮感越來越強，越來越傾向採取直接、強硬的手段來應對中國，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消極面比例越來越大。這就表現為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逐漸演變為“接觸+防範”，再演變到“接觸+規制”的過程。與此同時，中美關係內生動力逐漸增長、日趨強大。兩國經濟和社會相互依存程度很強，兩國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上密切合作，阻止了美國對華戰略中越來越強的徹底顛覆整體戰略

的負面衝動，給中美關係提供了“托底”。這兩方面組合在一起，就規定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整體框架、發展趨勢以及變化的邊界與限度。

特朗普的個性或許追求標新立異，其反建制色彩也勢必給其內外戰略帶來很多“非傳統”“非常規”的特性，但是從其競選期間以及勝選、上任後的涉華言行看特朗普并未超越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框架。其一，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對華強硬態度與其說是其個人或團隊的標新立異，不如說是美國從民間到戰略界對華觀點的一個折射。民主黨候選人以及美國兩黨建制派或許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具體涉華說法或者內在邏輯，但是在“對華需要更加強硬”上是高度一致的。如前述所謂“平衡中國崛起而非幫助中國崛起”的聲音，與特朗普競選期間的謀士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人的主張頗為相似。可以說，即便希拉裏·克林頓贏得2016年大選，其對華戰略也將是更加強硬的。其二，特朗普上任後，其涉華言論及動作總體趨向謹慎、穩健，特別是海湖莊園峰會後，對華政策基調趨于積極，都與中美關係強大內生動力所帶來的穩定性有關。面對中美關係現實，特朗普完成“學習曲線”的過程似乎比外界預計要快。其三，特朗普上任後，其在對華外交上最重視的是朝核與中美經貿關係。而無論是在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實踐還是在希拉裏·克林頓的競選主張中，這兩個議題也是最關鍵的議題。奧巴馬在與特朗普“交接工作”時，交代最多的問題就是朝核問題。幾個在政治光譜中位置不同的人物在涉華議題上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正說明美國國內在對華戰略上存在的共識與延續性。其四，特朗普外交政策上意識形態色彩較弱。特朗普也曾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但從未表現出要“塑造”和“影響”中國方向的意圖。特朗普將進一步助推美國對華“接觸”戰略走向普通意義上的接觸。其五，特朗普主要從中美競爭的角度審視中美關係，并未將美國對華戰略放在全球化、全球制度的層面去考慮。特朗普本人對國際體系更是表現出了強烈的懷疑和摒棄的態度。也就是說，特朗普在看待中美關係的層次上傾向于國家層面而非全球層面，這與冷戰後美國共和黨政府傾向從大國博弈層次看待中美關係的取向一致。從這幾個方面看特朗普政府迄今的對華政策已經顯示出較強的連續性。將特朗普對華態度放到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時間軸上觀察，就能看出特朗普的諸多言行祇是美國過去幾十年對華戰略邏輯演變基礎上帶有個人特色的一次新嘗試，是兩國關係的再次磨合。

特朗普及其領導下的美國政府行政當局在對華政策和態度上當然會有其獨特性。這些獨特之處部分地來自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特點，部分地由中美關係所處的最新歷史階段所賦予。

第一，“互惠(reciprocity)”

或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主要目標。從前述美國對華戰略的邏輯演變看，中美之間的接觸依然頻密，但“通過交往塑造中國”的“接觸”確已走到盡頭。可以印證這一變化的是，從2015年對華戰略大辯論開始，“互惠”越來越成為美國戰略界、商界討論中美關係時的“關鍵詞”。美方越來越多的人抱怨中國的市場與社會對美國的開放程度遠不及美國市場及社會對中國開放的程度，導致美國在中美交往中“吃虧”。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相關人士當然是從美國角度討論中美關係的互惠。這種抱怨是否公正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更值得關注的則是所謂互惠討論之下的邏輯：當美國自視為體系內的領導國家、而視中國為可以塑造、影響的相對弱小的對象時美國可以接受其眼中的不對等、不互惠情況；而當中美差距日益縮小，對華交往的“塑造”意味已基本消失，美國就很難再接受其眼中的“不公平”現象了。顯然，這一變化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自信的下降。

美國戰略界有關中美關係互惠性的討論，與特朗普個人在對外關係中強調相對收益的特點完全契合。特朗普傾向于從零和的視角看待中美經濟交往，在競選中多次表達中國在經濟上“占了美國便宜”的觀點。“美國與中國在經濟上相互競爭，而美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中國公司與美國做生意很容易，但美國公司與中國做生意就沒那麼容易。我們進入中國做生意要支付巨額稅收，可當中國對我們出售東西時，我們卻沒有收稅”。②特朗普政府官員的政策宣示也體現了特朗普“不再吃虧”、追求“互惠”的思維方式。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官員在陳述特朗普對華政策時明確表示，“中國的崛起造成了中美在經濟、軍事以及地區影響力等方面的快速失衡。特朗普政府尋求以一種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方式來糾正這一失衡”。在接待中國領導人訪美的吹風會上，美國政府官員在介紹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前提時也表示，“雙邊的投資和貿易必須是互惠的。中美要建立一個公平的、平衡的、基于互惠原則的經濟關係。”“互惠原則意味着我們希望與中國一道，用一種建設性的方式來減少中方設置的系統性的投資和貿易障礙。我們希望讓美國公司面臨的凹凸不平的競技場變得平整。”

第二，在行為方式上，特朗普政府表現出明顯的“交易型”特徵。特朗普一直自稱是善于談判的“交易大師”，著有《交易的藝術》一書。在其商業生涯中，特朗普頗善詭道，有時以并不光彩的手腕迫使商業對手達成協議。在競選中，特朗普就宣稱“不要忘記我們手中有對付中國的牌”。他認為，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大于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美國對中國有巨大的經濟牽制力，美國祇是沒有將其轉化為優勢。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明顯的“議題聯系”的做法。在與臺灣地區領導人通話引

起軒然大波後，特朗普2016年12月11日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專訪時說：“我充分了解‘一中’政策。但是除非我們能在貿易等問題上與中國達成一個交易，否則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受‘一中’的限制。”這番言論直接將中美經濟關係與“一中”政策掛鉤。在海湖莊園峰會後，特朗普又于2017年4月11日發表推文稱，“如果中國幫助解決朝核問題，將從美國獲得有利得多的貿易協議”，又將中美經濟關係與朝核問題掛鉤。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迄今在與中國“交易”的過程中，并未做出多少實質性讓步來作為籌碼。特朗普的做法主要是利用美國強大的實力對中國施加心理壓力，例如宣稱不受“一中”約束、指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商品施加高額關稅、在朝鮮半島周邊制造軍事緊張局勢等，隨後再以承諾“不改變現狀”(如回到“一個中國”政策、不指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或不對朝鮮使用武力等)作為交易籌碼，換取中國滿足其要求。當然特朗普的做法并非全然虛張聲勢。特朗普拿經貿問題作籌碼，與前述的“互惠論”有直接關係。美國戰略界要求在經貿問題上向中國施壓的聲音確實很高。特朗普拿“一個中國”政策做文章，也與美國戰略界近年來日益上升的“對臺虧欠論”有關。儘管美國戰略界主流反對特朗普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但是要求反思或在這一政策框架內向臺灣方面更多傾斜的聲音非常普遍。也就是說，特朗普拿經貿、臺灣地區等問題威脅中國：要麼美國改變現行政策；要麼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換取美國維持現行政策框架。

第三，特朗普政府團隊內部力量的消長，是決定近中期特朗普對華戰略的主要不確定因素。特朗普政府是美國歷史上組建最慢的一屆政府，迄今多數中高級政府官員仍未到位。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內部矛盾頗多，鬥爭激烈。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就職未滿一個月即被迫辭職已經說明問題。未來特朗普政府內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將對其內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就外交而言，特朗普政府內部最大的矛盾是主張“美國第一”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群體與主張國際主義的共和黨主流之間的矛盾。前者以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彼得·納瓦羅等特朗普競選顧問為代表。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期間以及上任之初也主要體現了這一特徵。如果這一股力量在特朗普外交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對華政策會主要聚焦雙邊經貿特別是貿易平衡等問題。後者則主要集中于政府高層，如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財政部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以及白宮高層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麥克馬斯特(Herbert McMaster)、國家經濟委員會加裏·科恩(Gary Cohn)等人。主流的共和黨“國際主義”更多地

將中美關係置于國際格局之下審視。2017年4月之後，特朗普在對華、對俄、對盟友政策上顯示出向後一派靠攏的跡象。美國媒體近期紛紛猜測特朗普團隊內鬥激烈，對特朗普影響極大的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賈瑞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夫婦與傳統主流派形成聯合。白宮是否存在人事鬥爭、誰將獲得最終勝利現在言之尚早。但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兩種世界觀是比較明顯的事實。此外，在“國際主義者”當中，在對華政策上還存在強調軍事安全問題的“國防鷹派”與強調金融利益、強調中國市場開放的“高盛幫”的差別。這兩類官員強調的具體議題、對華態度的強硬程度也都存在明顯差別。“國防鷹派”更可能將中美關係推向大國對抗，而“高盛幫”或許更有可能將中美關係導向大國合作。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未來的對華戰略可能向四種類型演變：“美國優先”背景下的合作、“美國優先”背景下的對抗、大國合作、大國對抗(如圖1)。特朗普政府內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縱坐標)，將決定美國對華戰略是在大國博弈背景下還是在“美國優先”背景下演變；中美之間的互動(橫坐標)，將決定美國對華戰略是以合作為基調還是以對抗為基調。截至特朗普上任百日，從中美兩國的互動情況看，美國對華戰略似顯示出從“美國優先”背景下的衝突向大國合作方向演變的趨勢，但這一趨勢能否確定、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仍需持續觀察。

五、餘論

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逐漸趨向強硬是一個總趨勢。顯然，特朗普政府任內中美關係也不會一帆風順。在看到這一趨勢的同時，也須注意到，以塑造影響中國為最終目標的“接觸”逐漸演變為純粹基于美國近中期利益的接觸，實際上意味着中美關係正變得更為平衡、平等。從現象層面看，中美關係似乎比過去困難了，但這是兩個日益居于平等地位的大國重新建構穩定關係的必經階段。奧巴馬政府後期中美關係短暫而朦朧的“新均衡”苗頭或許說明，當兩國都接受、適應了“體系內兩強”的位置後，兩國關係或許有可能達成新的穩定態勢。不過，這一態勢在奧巴馬政府任內出現得太晚，還來不及驗證，美國政府的換屆就打斷了這一過程。由于美國的政治體制原因，未來中美兩國要出現持久的新戰略均衡，既需要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均衡，需要兩國多輪的博弈與鬥爭，也需要美國不同觀點的政府反復摸索，直到在美國國內形成新的共識。特朗普政府未來在對華戰略上的探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5期)